

关于“趋同论”的研究现状和思考

朱 萌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山东威海 264209)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分崩离析,世贸组织的建立,世界经济加快了由区域化、壁垒性朝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人类社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相同特征,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不复存在了呢?两种制度能否趋同,敢问路在何方?一直以来理论界对“趋同论”思潮的产生时间、“趋同”目标及性质界定等方面争议颇多。本文通过对“趋同论”研究现状的考察,进而阐发自己的几点看法。

关键词 “趋同论”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D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67(2005)01-0046-04

随着现代化浪潮的迅猛发展,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是当代人类经济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世界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一种整体化过程和趋势。自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一批西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相继提出了“趋同论”思想,进而成为一种思潮在国外一度流行;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也出现了“趋同论”研究高潮。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其研究现状如何?怎样评价、认识和应对这股思潮?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不能忽视的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社会主义在苏东的受挫与巨变,社会主义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功败垂成。通过对“趋同论”的正确定位,对于帮助我们扫清认识误区,透过迷雾认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解决当前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信仰模糊、信念动摇、信心不足等深层思想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关于“趋同论”的研究现状

(一) 关于“趋同论”的提出时间

“趋同论”思潮的产生年代学术界历来颇有争议,难成共识,综合近10年来学界有关“趋同论”问题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可以看到大约有五种不同的提法:第一,30年代说。《社会主义研究》1996年第11期,郑吉伟在其《“趋同论”在我国的影响》一文中,认为“以熊彼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于本世纪30年代提出‘趋同论’主张,这时的‘趋同论’从表面上主张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趋同’。”第二,40年代说。中央教育学院科学研究所徐天向教授认为“两方的趋同论是20世纪40年代由西方学者索罗金1944年出版《俄国和美国》一文,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说。”第三,50年代末说。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叶启绩在其《全球化与“趋同论”辨析》一文中认为“到20世纪50年代末,面对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及其内蕴的巨大潜力,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不得不部分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并试图将社会主义优越性揉入资本主义制度中,

建立一种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制度。”由此可见,叶教授认为“趋同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第四,“萌芽说”。常祥在《“趋同论”研究 评价》一文中提到“趋同论萌芽于40年代初到50年代末。”第五,60年代初说。《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4期方小教在《隔雾观花的“趋同论”——批驳“趋同论”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开头就提到“‘趋同论’自本世纪六十年代初创世至今”,作者认为“趋同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可见,“趋同论”产生的具体时间众说纷纭,从最早的30年代到60年代初,跨度将近30年。

通过归纳、综合多方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多数学者认为“趋同论”思想产生于40年代初到50年代末,形成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补充、完善、发展于70年代到80年代末。如上海对外贸易大学教授、学术委员钱宗起、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程又中教授都赞同此说法。需要说明的,之所以没把30年代这个时间段归纳在内是因为以下两点理由:其一,“趋同论”的最早倡导者索罗金在1937年出版的《比较经济学》一书中首次提出“趋同”概念,但此时作为一种理论其内涵和框架并未形成,在随后的1944和1964年出版的著作中才逐步发展了他的这一理论。其二,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到40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效率、推动社会和谐进步方面均表现出当时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可比的巨大优越性,而此时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正经历持续危机。由此,一些西方学者才不得不正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趋同论”思潮逐渐引起西方社会理论界的强烈反响,因此,如果把“趋同”概念的提出等同于“趋同论”的提出,确有些牵强。

(二) 关于“趋同”目标的预言

西方“趋同论”者对“趋同”目标的预言有社会主义的,如早期代表人物约瑟夫·熊彼特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最明显的可以指望的事情。”^[1]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趋同”的结果是将融合为一种以资本主义

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三野昭一 1995 年在日本的《现代中国》杂志发表题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诸问题》的文章，文中认为：中国在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性质趋同的倾向。中国正处在“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倒退的过程”中。有的西方“趋同论”者提出，“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高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得不单方面趋近于西方制度模式。”^[2]美国著名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直言不讳地指出，“所谓趋同论的主要之点实质上不在于它倡导什么趋同，而在于它能把敌对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吸收掉，融化掉。”^[3]不过，在西方“趋同论”者中，除有这种或者那种资本主义趋向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趋近于资本主义的两种对立的“趋同”论点外，更多的人，都没有在“趋同”的目标是“同”于社会主义还是“同”于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上下过非此即彼的结论。即使“像福山这样著名的现存体制辩护士也承认社会主义在‘全球化’时代非但不会消失，反而会以新的形式存在和发展。”^[4]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将“趋同”看作一种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第三种社会”，称之为“人民资本主义”、“法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在 1937 年出版了《比较经济学》一书，1944 年发表了《俄国和美国》一文，1964 年又出版了《我们时代的基本趋势》一书。他在这些著作中不断重申趋同论，不断完善和丰富他的论据资料。索罗金认为当时的“两制”将趋同为混合的社会化类型——“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形式”。“如果人类能够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克服目前面临的危急状况，正在产生的社会文化形式，也许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可以称之为一体化的特殊形式。这一形式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形式。”^[5]1958 年美国经济学家巴金汉出版《理论经济制度：比较分析》一书，提出“正在发生的现实经济制度，差别不是越来越大，而是变得越来越小”。美国研究世界体系的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资本主义将成为过去，它的特定历史体系将不再存在。”“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吸引人的演习——一次特殊和异常时期的演习，但可能是向更为平等的世界过渡的漫长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或者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人类剥削形式，在它后面，世界便回复到较为稳定的形式。”^[6]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加尔布雷恩提出，“两种经济制度趋同论”，他在 1967 年出版的《新工业国》中指出，“趋同是伴随着大规模的现代生产、复杂的技术，特别是作为复杂精密的组织管理而产生的”，“苏维埃和西方两种经济制度……在计划上趋同了”，“苏维埃和西方制度存在着可计量的向相同的计划形式发展的趋同”。^[7]美国的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在 1965 年出版的《美国和苏联的政治权力》一文中提出了“技术行政趋同论”，认为两种社会制度都在日益完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的技术性在两种制度下是相同的，必然导致建构相同的政治制度。两种社会制度都由那些掌握着技术性知识的官僚统治，“技术官僚”相同的管理手段将使两种社会制度同一方向发展，即“技术官僚趋同”。“现在是学者们坦率地承认现代化过

程有两种路线的时候了，正如彼得·沃斯利正确指出的，现代化本身不像任何其他事物，它既有采用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也有采用社会主义路线的现代化，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含义，……这两条道路在某些过程上具有共同性。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一些截然不同之点。”^[8]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 1962 年发表的《工业社会十八讲》中认为，“苏联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同一类型的两个品种，或者是同一社会类型（即进步工业社会）的两个形式”，提出“工业社会趋同论”。

（三）关于“趋同论”性质的评价

如何界定“趋同论”的性质，也是学界历来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广西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的黄江泉在《全球化下的“趋同论”辨析》一文中认为，“‘趋同论’缺乏现实的科技支撑，它的本质是为资本主义做辩护”。^[9]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社科系高英杰指出，“从本质上讲，‘趋同论’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地球上的并存竞争、相互借鉴这种历史现实的歪曲反映。”^[10]徐天西则直截了当地以“趋同论不是一种科学理论”命题，文中他也指出，“‘趋同论’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说。”^[11]常详《“趋同论”研究 评介》一文把“趋同论”直接定位在“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12]同时常祥还认为“趋同论”还是“极富有欺骗性的资产阶级理论”。方小教基本赞同这种提法，认为“‘趋同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3]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南昌航空工业学院的丁群安教授，也称“趋同论”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并对这种思潮对我国人民思想的危害表示了极大忧虑。丁教授在 2000 年 9 月曾对一所高校教职工的理论信念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回答“按现在的理论搞社会主义，我们国家会不会与资本主义越来越接近？”这一问题时，有 69% 的人持“会”和“说不清”的态度，只有 31% 的人认为“不会”。^[14]可见，“趋同论”对人们思想影响的严重程度。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程又中教授在《社会主义研究》1997 年第 5 期《“趋同论”发展的历史背景分析》一文中提到，“‘趋同论’是在一定的历史大背景下兴起和流行的，西方资产阶级文人鼓吹的所谓‘终结论’”。^[15]但在《社会主义研究》2002 年第 6 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趋同论”的几点思考》中程又中教授又对“趋同论”的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位。他认为，“‘趋同论’是在观察当时‘两制’表面现象基础上对‘两制’关系发展趋势的一次初步的、肤浅的把握。它虽有片面性，但不失对‘两制’关系予以认识的全过程中的一个片段。”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钱宗起教授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三制”（“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和“社会失业保障制”）的批判角度出发，认为“‘趋同’论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辩护剥削行为做出‘理论’贡献”。^[16]

二、几点思考

（一）“趋同论”与世界大同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全球一村、世界一家”，人类走向大同有其必然性。但是世界走向大同的道路是漫长的，同时又是在不断的量变中逐步实现的，这里所说的量变当然也指今天世界的变化。世界大同的社会主义定义

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只能设想一些基本原则,如文明、自由、平等、福利、幸福、和谐等等一些基本特征,而制度只能由将来的历史抉择,因为制度的引进是制度设计和互动发展的结果。我们无需为后辈担忧,未来的人类更聪明。著名学者高放也谈到:人类最终趋向一致,但这种趋向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更高水平的社会,会是更高类型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在未来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可见,西方学者所讲的“趋同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走向大同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珍视、学习和发扬中华文明中的优秀成分,特别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观和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为21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趋同论”与“沟通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出版的吴江先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一书,由8篇近两年在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集合而成。在书中吴先生选用了“沟通”一词,乍看上去,与“趋同”颇为相似,但通读全书可知,吴先生旨在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提供一条沟通的渠道,使社会主义获得新的动力,并不是抛弃社会主义。文中所阐述的“沟通论”观点大体可以概括如下: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创造了许多可拿来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成果,不继承则难以建成社会主义。因此,吴老先生把着眼点放在社会主义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是更高类型的社会制度,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有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吴江先生的“沟通论”启迪我们在发展中要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经验、体制,促进社会主义发展。我们必须学习它的优点,因为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点,但是这种学习并不是说要无条件的全盘照搬过来。总之,吴先生的“沟通论”与西方学者和寻常百姓的“趋同”观点是有本质差别的。通观老先生的思想,他的观点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

(三)“趋同论”与“共赢、共存”

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谈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发展。”“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2002年在党的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江泽民讲到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时又指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有各国平等协商。”“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当前

中国的对外政策主张两种社会制度“求同”、“共存”从而达到“共赢”,这是否就意味着承认两制的“趋同”呢?如何理解这种“求同”、“共存”、“共赢”?笔者认为“共存”不是简单的消灭资本主义:第一,这是立足现实的正确选择。当今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仍在发展,未到灭亡的时候,且明显强于社会主义,现在代替它还不现实。第二,当前社会主义处于劣势,在探索中,仍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获得优势,目前只能安心办好自己的事,创造优越性,用事实逐步说服人们坚定信念。第三,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一切,尤其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两制”在战略相持阶段要求共存,都在努力学习,我们要做得更快、更好,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社会主义。最后,人类抛弃资本主义选择社会主义还要很长时间。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信仰相矛盾,但实际上这些表面现象反倒证明这一规律的确性。因为在市场经济浪潮下,随着普选制度、议会民主等政治体制发展的推进,势必导致两种制度表现出一致的东西,必然导致我们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但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不同,我们没有丢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信仰,也不赞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终一起演变成第三种制度。我们的根本目的还是立足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在看来还处于劣势,需要自我完善,使社会制度充满活力,给人类指明前进方向,两种制度必须经过“共存、共赢”的阶段,并进而超越资本主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代替资本主义。如果我们一味的就是把资本主义视为猛兽,只顾闭门造车,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代替了。目前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处于劣势地位,但像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当今世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被世界公认。正如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所说:“中国的参与,从根本上改变了成功必须的规则和战略,”^[18]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自己,要在全球化进程中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投身于这个过程中,学习、吸纳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努力发展生产力,缩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基础。这个过程不是“趋同”的过程,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发展的必然,是为了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

注 释:

[1] 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1942

[2] 罗斯托. 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

[3] 辛向阳. “趋同论”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14

[4] 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38

[5] 索罗金. 我们时代的基本趋势. 纽约 1964: 78

[6]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历史资本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108—109

[7] 加尔布雷恩. 新工业国. 波士顿 1985 (4): 15

[8] 亨廷顿等.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40—42

[9] 黄江泉. 全球化下的“趋同论”辨析. 昌吉学院学报, 2003, (1)

[10] 高英杰. 对经济全球化与“趋同论”的辨析. 常熟高专学报, 2001, (3)

[11] 徐天西. 趋同论不是一种科学理论. 高校理论战线, 1994, (1)

[12] 常祥. 《“趋同论”研究》评介. 东岳论丛, 1997, (5)

[13] 方小教. 隔雾观花的“趋同论”——批驳“趋同论”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研究, 1997, (4)

[14] 丁群安. 要善于从本质上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评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向论”. 南

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 2002. 6, 4 (2)

[15] 对于“终结论”的观点程又中在其下文中也略有提及, 但没有展开论述.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应比较‘趋同论’与‘终结论’在发展条件上的特点, 应将两者联系起来探讨它们的思想实质和主旨. 不过这里已是另外的研究题目了。”

[16] 钱宗起. 警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论的再现. 国际经贸探索, 2003. 2, 19 (1)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18] 莱斯特·瑟罗. 新经济地图.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王文江]

(上接第3页)

根深蒂固, 稍不注意就脱口而出. 有些框架有凝固性、整体性. 里面成分的结合有超常性, 拆散框架就不能另行单独组合. 比如“人不人鬼不鬼”可以说, “人不人”或“不鬼”就不能单说. 又如“不男不女”也一样. 是“不X不X”这个框架使不能结合的词也能结合. 又如“人不人鬼不鬼”、“男不男女不女”, 也不能单说“人不人”, 是“X不XX不X”这个框架使焉, 拆散单说X不X也不行, 必须是并列对举才行. 又如“唱支山歌”的“支山歌”不能离开双宾框架而自由作其他成分. 又如“鲁迅浙江人”这个“名·名”组合能成句子, 依靠的是主谓框架赋予的力量, 离开主谓框架和语用条件, 就失去活动能力. 又如“借你两本书”拆开单说“借你”不行, 意思变成“把你借走”, 只有在双宾框架中才有“给你借”或“借给你”这个双宾框架赋予的意思. 总之, 语言中有语法框架, 有一般的、有特殊的和个别的, 它们的内部词语各有固定位次, 必须填充语义上和语用上与之匹配的词语, 否则就形成病句.

没有学过语法知识的人也会发现病句, 有的会改正病句, 就是因为觉得不合语感, 所用词语与框架不适应, 或位次不对头, 或两个框架不该套在一起. 于是改到合乎语感为止.

至于讲位次问题, 我们的先辈的著作早就回答了讲位次的必要性问题. 黎氏讲“位”, 马氏讲“次”, 不是无中生有. 讲分布就要讲词语或成分所处的语法位置, 讲框架和核心也需要讲各成分或词语在某框架的位次. 动句的基本框架是“主位、状位、核位、补位、宾位”或“状位、主位、状位、核位、宾位”. 主位就是居主语的位置, 状位就是居状语的位置, 余类推, 很好理解, 等于简称. 用简称就是求语言经济, 减少使用的字数, 更主要的是为了便于讲框架. 除了讲句法成分与句子核心的相对位次之外,

各类实词也要讲位次, 黎氏只讲了名词的几个位次, 这方面也可以探索.

六、框架核心析句法适用于电脑使用吗?

框架核心分析法是为人脑分析句子而设计的析句法, 电脑析句法应该大不相同, 这是因为电脑与人脑大不相同. 但是都是析句法, 又有共同之处. 电脑是人制造出来的, 人脑有语感, 语感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如何把没有语感的电脑培养成有语感的电脑, 这就要靠人脑去完成. 人脑的语感中有语法框架, 就应让电脑存贮应有尽有的框架, 人脑语感中还有丰富的词语库和背景知识库, 就要让电脑贮备这些东西才能教会电脑分析、理解和生成合语法、合语义、合语境的句子, 设计电脑析句法完全抛开人脑析句法, 是不可能的. 在解释力较强的各种人脑析句法中选一种作为电脑析句法的基础, 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选哪一种人脑析句法就有待内行人了.

参 考 文 献

[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商务印书馆, 1980

[2] 黄伯荣. 谈句法分析. 中国语文, 1981. 5

[3] 陆丙甫. 主干成分分析法. 语文研究, 1981

[4] 张志公. 现代汉语.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年

[5] 史有为. 语言的多重性与层核分析法. 汉语析句法讨论集, 1984

[6]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 (增订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7] 钱乃荣. 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研究室. 句型与动词. 语文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 张志立]